

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挑战

张 小 山

从统一科学观的缺失到决定论原则的谬误再到价值中立观的玄想，文章系统评述了二战后日益流行的反实证主义思想各流派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提出的责难。作者认为，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对立突出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这又根源于两派在本体论上的不同认识，从而在社会学中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范式，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要求下，它们都能产生出富有价值的成果。因此，在批判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时，我们不可轻易地偏执于其中任何一方。

作者：张小山，男，1963年生，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教师。

实证主义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中诞生最早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理论流派，它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随着二战后各种反实证主义哲学观点的进一步流行，实证主义社会学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愈发充分地显露出来，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责难。

一、统一科学观的缺失

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假设（有的称之为本体论自然主义公设），便是断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即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存在本质的不同，并据此认为科学是统一的，不同的学科遵循某些相通的研究原则。对于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推论则是：社会学可以仿效自然科学的模式，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成为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精密科学。上述观点常常被称作统一科学观。作为社会学最早的一种理论流派，实证主义社会学持有统一科学观是不足为奇的。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促使19世纪的许多西方思想家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引进社会研究领域。社会学的创造人孔德（A·Comte）便是其中著名的一员。孔德明确地将社会学规定为一门旨在以实证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所谓实证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自然科学那种将理论解释建立在经验证据基础之上的系统方法。孔德原先将社会学称作“社会物理学”，这充分显示出他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看法和对物理科学的倾心。在他看来，社会虽比自然更为复杂，但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它同样服从某些基本规律；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它们只是科学统一体的不同分支。社会学的理想是象物理学一样，建立起一种由几条基本定理组成的，高度抽象、逻辑严密同时又经得起经验事实检验的理论体系，藉此各式各样的具体的社会现象得到有效的解释和说明，甚至凭借它可以预测和控制许多社会事件的发生。^①

^① 参见孔德：《实证哲学》（法文版）第I卷，第19—26页（Auguste Comte: La philosophie Positive résumé par Emile Ricolage, Paris）。

必须指出，统一科学观得到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拥护和支持，并在社会学研究中形成一种注重实证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传统，这与19世纪以来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两大思潮之一的科学主义是同源合流的。19世纪英国著名的社会思想家、哲学家穆勒（J.S.Mill）赞同孔德的基本观点，他在其重要著作《逻辑体系》中指出，一切呈现规律性的现象都适合科学研究，而包括人类行为在内的一切自然现象均被假定存在这种规律性。他认为并不存在两种现象，一种是自然的，另一种是非自然的，所有现象最终都必须服从建立在归纳基础之上的因果解释。^①在当代，不少社会学家仍然坚信孔德的统一科学观，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特纳（J.H.Turner）曾撰文呼吁社会学应该返回到孔德那种将社会学当作一门科学的最早观念那里去。^②他说：“我们能够发掘出有关宇宙不变特性的抽象定理”，^③“我们设想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所谓的‘一门社会的自然科学’是可能的，社会学的理论原则可以并且应该类似于那些自然科学。”^④

然而，对统一科学观的怀疑和否定也在同期诞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20年以来，这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德罗伊（J.G.Droysen）就指出历史学的任务是应用理解范畴去把握历史事件内部或后面的“意义”与“本质”，而不是运用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试图根据较早的事件去推导较晚的事件，德氏是明确区分理解和说明的第一个人。其后，对社会学方法论影响很大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他继承并发展了其先辈施拉依马赫（F.Schleiermacher）有关解释学的主要观点，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称之为精神科学）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并指出理解才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真谛。狄尔泰的名言是：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思想、无意识的物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发生的是单方面的主体认识和解释对象的关系；但社会科学涉及有思想、有意识的人和人的历史，这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处于一种双向的理解关系。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认识、自我理解的学问，它必须回答有关生活的意义问题。因此，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明方法并不适合社会科学，而理解艺术的运用才是社会科学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事物的认识，理解不是手段，理解人自身即是目的；理解人，实现人的自我理解，成为社会科学对人生负有的责任，由于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直接地进入他人的经验和思想之中，所以理解便成为个人了解他人的间接的同时也是唯一的方式。^⑤总之，狄尔泰以其深刻的洞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筑起了一座高墙，向以孔德为代表的统一科学观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并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论战。

按德国学术界的习惯，科学向以被分作两大类：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或人类科学），而后者与前者在性质上被认为是根本不同的。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凯尔特（V.H.Rickert）就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两类，并认为两者无论在“质料”上（研究对象上）还是在“形式”上（方法上）都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从质料上看，“自然

① 参见Alan Rya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13.

② Jonathan H. Turner: "Analytical Theorizing" in *Social Theory Today*,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and Jonathan H. Turner, Polity Press, 1987, p.191.

③ 同②, p.153.

④ Jonathan H. Turner and Robert A. Hanneman: "Som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Societ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1984*, edited by Randall Collins, Jossey-Bass Inc., 1984, p.1.

⑤ 参见殷鼎: 《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241-242页

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①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可以不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而“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它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②因此一切文化产物都必然依附于价值，都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从形式上看，自然科学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于“无价值”事物和现象都有效的普遍联系和规律，并因此必须用“普遍化的方法”；而文化科学则必须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并因此必须使用“历史的方法”。^③

虽然李凯尔特只是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作了形而上学的划分和解释，但毕竟有助于人们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异。反对统一科学观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体，其本质往往是一次性生成的，换句话说，它们都具有相当稳定的属性；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和人类历史，其本质是处于“未完成状态”的，是开放式的，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改变周围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我和关于自我的认识。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鲜有比较精确地重复出现（当然自然现象也不可能绝对精确的重复）。因此，自然科学的模式不适于社会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社会研究势必误入歧途。正如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H.G.Cadamer）指出的：“如果人们以对规律性深化着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人们就没有正确把握精神科学的本质。”^④

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Weber）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对统一科学观提出了批评，按照本顿（T.Benton）的话来说，“韦伯关于方法论的文章通常是以调和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为特征的。”^⑤韦伯显然受到德国传统解释学和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物体，他有他行为的动机，他的行为受其主观意图的指引。不仅如此，社会行动者对他们何以要那样行动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解释，而这种想法和解释本身就是对于他们行为的任何综合说明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是说，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社会行动者自身的理论和概念，涉及他们的主观世界，而不象自然科学只是处理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物体运动，无需考虑物体的“主观世界”。因此社会科学必须运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投入的理解”。韦伯相信，我们能够让自己设身处地于其他人的环境中，即利用某种移情联系，通过想象我们在类似的环境中会如何行动，以此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动。韦伯主张将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十分强调对社会行动者的动机、意图、愿望等主观内容的理解。^⑥正因为如此韦伯的社会学又被称为“理解的社会学”，它与追求“统一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当代，哲学家温奇（P·G·Winch）对统一科学观再次提出激烈的批评。他继承并发展了韦伯的一些基本观点，在其重要著作《社会科学的观念》中指出，社会科学家易于误解他们自己的实践，错误地认为他们关注的解释类型与自然科学家的极为相似，而实际上这两

①② 〔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页。

③ 参见〔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⑤ Ted Bento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Sociologi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7, p.112.

⑥ 参见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 Roth and C. Wittl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1—5.

者存在根本的区别。^① 温奇理论的前提是肯定人基本上是遵循规范的动物。这一观念是他从维特根斯坦 (L·Wittgenstein) 的哲学中借用而来的, 同时这也是一些伟大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 (E·Durkheim)、韦伯、帕森斯 (T·Parsons) 等极为重视的一个观念。温奇认为, 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生活中的社会规则和他对这些规则的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的, 行为之间的联系是“概念”上的内在联系, 而不是“经验”上的外部联系, 它们不属于因果分析的范畴。^② 也即是说, 将社会行为看作遵循因果规律的行为是一种谬误, 要想真正理解和解释社会行为, 只有将其视作遵循有意义的社会规则的行为。温奇还批评韦伯对统一科学观作了过多的让步, 十分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极力主张社会科学必须运用本质上异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 当代社会学中几个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 布鲁默 (H·Blumer)、舒茨 (A·Schutz)、加芬克尔 (H·Carfinkel)、哈贝马斯 (J·Habermas)、吉登斯 (A·Giddens) 等尽管各自的理论旨趣不尽相同, 但他们在反对统一科学观这个问题上却持同样的立场。他们一再强调, 社会研究者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生活所呈现的规律感兴趣, 最使他们关注的是如何理解行为者自己赋予其行为的意义, 正是这些有意义的行为才产生了社会现象的规律性。此外, 社会事物的本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因而用以把握这些事物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固定不变, 社会学的理论只能是“暂时的”, 以灵活性和敏感性为特征, 作用是帮助我们理解特定时空中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方式, 展示各种富有建设性的取向; 社会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致力于创造出类似自然科学的高度抽象、结构严谨而又与经验事实相符的概念系统。一句话, 统一科学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决定论原则的谬误

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强烈影响, 实证主义社会学在认识论上带有浓重的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色彩。它断定社会是受一定客观规律支配的系统, 并认为社会学的目的就是创造一套概念系统与之同构, 据此, 社会现象可以得到有效的预测。孔德指出, 科学的基本前提是“将所有现象看作服从某些不变的规律”, ^③ 社会学的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 发现那些支配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规律。穆勒同意社会是一个决定论系统的说法, 相信只要拥有任何社会在某一点上(时刻)的完备知识, 同时掌握了作用于社会系统的因果规律, 就可以预测社会系统在任何时候的状态。^④ 斯宾塞 (H·Spencer) 则断言: “只要还存在认为社会秩序不顺从自然规律的信念, 就不可能彻底承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⑤ 迪尔凯姆也曾说过: “除非确认社会规律与支配着自然界其他部分的规律并无不同, 并且确认发现社会规律的方法同其他科学的方法是一致的, 不然便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奥古斯特·孔德的贡献。”^⑥

但是, 在持有人文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看来, 将社会看作服从某些不变规律支配的系

① 参见 Alan Rya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p127—128.

② 参见 Alan Rya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133.

③ 孔德: 《实证哲学》(法文版)第 I 卷, 第 23 页。

④ 参见 Alan Rya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206.

⑤⑥ 转引自〔英〕艾伦·斯温杰伍德: 《社会学思想简史》, 陈玮、冯克利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51、107—108 页。

统，乃是漠视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主体作用的一个严重谬误。人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的创造者，没有人，所有这些就既不可能也毫无意义。他们尖锐地批评说，在实证主义者眼中，主体的人不过是“自然法则”、“不变规律”操纵的工具，也许人们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掌握一些生存技巧，做一个相对舒服的奴隶，但绝不可能改变他遭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这种指责看来切中了要害。因为孔德曾表达过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信念：“真正的自由仅在于对自然规律的理性服从。”^① 正象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 Horkheimer）一针见血指出的，对于实证主义来说，“人的活动依赖于当下自然秩序的知识，而不是这个秩序本身及其对它的知识依赖于人的活动。”^② 人文主义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会领域根本不存在自然领域中那种不受时空限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永恒不变”的规律，社会规律（如果有的话）都要受到一定的时空限制，它往往只具统计意义，而且在人们的能动作用下具有不稳定性或变异性。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阿隆（R. Aron）说过：“如果人只是早已注定的命运的同谋，政治就是毫无价值的活动了。政治是因为未来尚未肯定，某些人能够创造未来才成为人类的一种高尚的活动。”^③ 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K. Jaspers）也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一点）：并不存在决定事物整体道路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未来取决于人们在决断和行为上的责任心，归根到底，取决于亿万万人中的每个人的责任心。”^④ 正是因为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处于“未完成状态”，人们改变生存条件同时又改善自身的社会实践是一种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又永无终点的过程，所以社会领域不可能存在严格的决定论。人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中被动的客体，他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建设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从决定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断定社会学可以通过发现支配人类社会的规律，从而有效地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象自然科学对物体的运动状态所作的有效预测一样。坚信预测是科学的主要功能是实证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孔德声明：“研究是为了预测，此乃科学的特性。”^⑤ 又说：“……作为构成科学的基本特性的预测，于是成为一切理性行动的基础。”^⑥ 当代大多数学者也不否认解释和预见乃是科学的两个主要功能。^⑦ 问题是实证主义的社会预测观，都或隐或现地假定社会将按一定的道路发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例如孔德的三阶段论（认定人类社会必然依次经历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这三阶段），而这种假定显然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正犯了波普尔（K. R. Popper）严厉批判的历史决定论的谬误。波氏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由于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因此我们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他解释说，这并不是取消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人们可以预测某些事件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而是说我们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⑧

事实上，社会科学的预测具有某种“干涉”作用，它会影响预测对象的状态和发展，从

① 孔德：《实证哲学》（法文版）第三卷，第61页。

② [德] 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4页。

③ [法]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

④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哲学自传》，王立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⑤⑥ 孔德：《实证哲学》（法文版）第四卷，第254、261页。

⑦ 参见[美] R. S. 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0页。

⑧ 参阅[美]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辑、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而使预测结果产生畸变。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作出某些社会预测，目的就是为了干预现实——促使好的结果发生，避免不利的因素发展。这意味着社会预测和人类干预是分不开的，实际的结果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既然任何社会预测的结果有赖于一定的初始条件的实现，而人类的干预作用势必改变这些条件，因此社会预测的结果原则上是不可能确定的，对于长期的预测就更是如此。由于人类的干预作用，社会科学的预测可能会出现下面两种引人注目的情况，一种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即预测本身将导致预测结果的发生，一些市场预测便属于此类；另一种叫“自我否定或自杀式预言”，这类预测往往使得有关的人们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避免预测结果的发生，从而实际上使预言破产。^①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预测的上述特性在自然科学中是见不到的，天体并不因天文学家的预测而改变运行轨道，因而一些实证主义者将社会预测等同于自然科学的预测，等同于看上去受严格决定论支配的天文学的预测显然是误入歧途。牛津大学政治学和哲学教授赖恩(A. Ryan)总结到：“显然，无论是作为实践的依据还是作为知识的可及目标，将预测的社会科学与天文学相提并论的企图，其价值都是可疑的。”^②

在人文主义社会学家看来，实证主义社会学将社会事实实体化的做法，侧重研究社会结构的倾向，同样犯了无视人的主体性的毛病。迪尔凯姆接受了孔德的基本观点，主张将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看成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外在事实：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都是独立于个人同时又约束、控制人们的行为的实体，它们有着自身的特性和演变的规律。迪尔凯姆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将社会现象看作是社会本身的现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外部事物，必须摆脱我们自己对他们的主观意识，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研究。”^③又说改变社会现象是很困难的，“个人的志愿不能随便改变它，它本身的力量却可以主宰个人的志愿，象模具一样，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使我们的行为不脱离它的范围。”^④一般来说，实证主义社会学倾向于将社会结构摆在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而把人类行为看作受社会结构制约、影响的产物，这也是西方主流社会学的一向观点。帕森斯的功能理论便是明显的例子。虽然帕森斯受韦伯的影响，早期十分注重“社会行动”这个概念，看似更强调人受主观意识的支配，但只要系统地考察一下帕森斯的著作，便会同意波洛玛(M. M. Poloma)的看法：“在帕森斯的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并不是人，而是体系的行动。”^⑤“作为一个宏观理论家的帕森斯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那些指导和调节人类行为的社会价值和规范。”^⑥

针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上述观点和理论倾向，以互动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家强调指出，社会真实存在着的只是人们之间的互动，社会结构不过是人们互动的产物，它们根本不可能独立于人的互动而存在，是社会结构依赖于人，而不是恰好相反。因此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应是人们的互动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社会结构。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认为，社会由通过相互交往联结在一起的个人所组成，它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交往的形式，一旦交往全部停止，社会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他明确反对将社会组织实体化的做法。作为米德(G. H. Mead)象征互动理论的继承人，布鲁默坚持互动先于结构的主张，他认为正是“群体生活中的社会过程创造和支持着规则，而不是规则创造和

① 参见Alan Rya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0, p.210.

② 同上书, p.209.

③④ [法] 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胡伟译,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第23、24页。

⑤⑥ [美] 玛格丽特·波洛玛: 《当代社会学理论》, 孙立平译,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第144、126页。

支持着群体生活。”^①另外一些批评者不象布鲁默那么极端，注重社会心理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库利(C.Cooley)认为，社会和个人是相互依赖的，“‘社会’和‘个人’并不代表两个事物，而只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②吉登斯进而指出，个体行动、互动、社会结构都是相互包含的，它们并不构成各自分立的客观现实，而是构成同一现实中的双重性。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不是什么神圣的、永恒的制约力量，并不把人变成机器人或愚者。结构内在于互动者的日常活动中，并由这些日常活动所再生产。结构既制约人，同时也给人以能动性。^③

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不同，人文主义社会学家倾向于将人放在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并把人看成是不断创造、自我生成的主体，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被决定的客体。在他们看来，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世界的“外在性”、“强制力”只是暂时的“现象形式”，并不构成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具体的社会形式或结构不过是反映了某个时期、某个类型社会的特性，而社会理论的任务不仅在于揭示这些特性，更重要的是要指明坚持人类超越社会世界的主体性的道路，重建合理的社会关系。他们进而批评到，迪尔凯姆提出的社会事实的概念过分强调具体社会形式的普遍的、必然的特性，这是对历史的否定，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贬斥，是对现实抱顺从主义态度的提倡，它实际上导致了一种保守的政治观。^④在下一节里我们还将提及反实证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详细的批判。

三、价值中立观的幻想

实证主义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仿效自然科学，将客观性奉为圭臬，以消灭主观偏见或保持价值中立为基本原则，力主运用中性语言、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现象的秩序和规律。在这方面，迪尔凯姆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将孔德的“使想象从属于观察”的研究原则具体化，提出了三条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1)“在科学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2)“根据社会现象的外部共同特征进行定义”；3)“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⑤他说：“一言以蔽之，考察社会现象，必须观察实际，不能掺进个人的想象，否则就无法了解它的真相。”^⑥不那么极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更倾向于接受韦伯倡导的在社会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的主张。韦伯认为，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要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潜在基础，它可以影响研究者的选题和研究目的，但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作出结论时不应受自己的价值观和物质利益的左右。在许多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心目中，只有摆脱了个人的主观偏见、驱逐了价值判断，社会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他们同意罗素(B.Russell)“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⑦的看法，认定社会学必须提供超越个人狭隘经验、得到广泛验证从而具有普适作用的系统理论。

迪尔凯姆的“排除一切成见”的主张，看来是误解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因而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责难。其实，任何观察、任何描述都不可能“排除一切成见”。现代

① 转引自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孙立平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②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4页。

④ 参阅Ted Bento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Sociologi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p.93.

⑤ 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8、36页。

⑥ 同上书，第16页。

⑦ 〔英〕伯特兰·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认知心理学通过大量的知觉实验证实纯粹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凡认识必然带有主体性；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波普尔、库恩（T.S.Kuhn）、费耶阿本德（R.Feyerabend）等多方论证并反复强调“不存在中性的观察陈述”，“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关于这点，孔德的见解倒是深刻的，他曾说过：“对于所有现象，即便是最简单的现象，任何观察只有经过理论的指导和解释才是有效的。”^①这表明孔德自己已经意识到“客观的观察”的局限性。确实，观察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观察的对象，还取决于观察者本人的经验、知识和期望，观察是观察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完全排除主观性的观察只能是幻想。

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主张的“客观研究”原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该派看来，社会研究根本不可能排除主体的旨趣及其他主观因素的影响。对事实的接受、选择、描述和综合不可能没有重点和方向，概念的使用也不可能不牵涉到特定的主体旨趣、甚至全部社会实践。^②该派的头号人物霍克海默指出：“在这里，经验、‘给予的东西’都不是某种直接的、为一切人共有的和独立于理论的东西，而是由这些句子存在于其中的整个知识构架作为中介传递过来的东西，即使这个构架指称的实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③即是说，独立于理论之外纯粹的经验事实是不存在的，实证主义所谓的客观事实都要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霍氏论证到：“当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积极的人看到世界的肮脏状况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就会成为主导性原则；他会用这个原则去组织给予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纳入一种理论之中。”^④这说明实证主义企图把主体的旨趣从研究领域驱逐出去的做法，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霍氏进而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理论立场：“在辩证理论中，整个社会表现的主观兴趣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这个事实，没有被看作是错误的标志，而被看作是知识的内在因素。”^⑤显然，这与实证主义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

法兰克福学派还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帜，实际上隐藏着维护既定现实的顺从主义倾向。关于这个问题，马尔库塞（H.Marcus）的分析相当深刻：

诚然，纯科学的合理性在价值上是自由的，它并不规定任何实践的目的，因而对任何可以从上面强加给它的外来价值而言，它都是“中立的”。但这一中立性是一种肯定性。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⑥

在技术现实中，物质和科学都是“中立的”，客观现实既无目的，又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构造的。不过，正是其中立特征把客观现实同特定历史主体联系起来，即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其中立性则是通过这个社会并为了这个社会确定的。^⑦

马尔库塞指责实证主义社会学采取“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将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下来，通过提倡所谓“中立性”，把多向度的语言清洗成单向度的语言，从而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肯定和维护既定社会现实、阻滞超越和进步的作用。他总结到，“这就是实证主义所起的作用，它否定理性的超越因素，因而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在学术上的对应物。”^⑧与实证主义社会学迥然不同，法兰克福学派以“推翻既定事实”、“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为己

① 孔德：《实证哲学》（法文版）第三卷，第104页。

② 参见刘继：《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③④⑤ [德] 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157、158页。

⑥⑦⑧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0、14页。

任,将超越现实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他们公开宣称自己的理论为“批判理论”,为的就是与以实证主义为首的“单向度”的传统理论划清界限。

或许,当代哲学解释学对实证主义的“客观研究原则”以及“价值中立观”的批判更加彻底。该派公开为“先见”或“偏见”辩护,并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海德格尔(M.Heidegger)指出:“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见到之中”,“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①海氏所谓的“先见”,意指我们在思考与解释时所必须借助的语言、观念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语言、观念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本身就会给我们带入某种先入的理解,而这些又不可避免地会渗进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和解释之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先见介入解释并使解释成为可能,先见已经是我们认知主体的历史存在形式,并时刻为解释的发生充作起点。^②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在老师的上述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看来,科学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的生活和创造了历史的人的历史意识,科学方案不能脱离成见。^③事实上,科学不仅不能消灭先见或偏见,而且它本身就是先见的一部分,它通过理解与解释扩大和改变着先见的范围。对伽达默尔来说,迪尔凯姆那种“在科学研究中排除一切成见”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偏见,所谓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以偏见反对偏见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当然,人们在先见面前也并非完全处于无所作为的状况,人们在现实中可能会接触并吸收某些妨碍正确理解的见解,对于这些“盲目的先见”,伽达默尔就主张积极地加以祛除。^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绝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先见或偏见,相反,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先见被拓展了,同时,先见又是人们认知的起点,是主体向未来世界开拓的前提,它协助主体完成新的理解和解释。

对于实证主义社会学提出的尽可能使用数学的形式化语言来解释社会现象的主张,许多学者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学理论应是一种其基本概念和命题均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的完全形式化的系统,如此才能符合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祛除了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虽然抽象的数学语言确可避免日常语言的含混性和歧义性,而且自伽利略(G.Galileo)以来,数学已被公认为至少在原则上能使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形式化的基本语言。但批评者认为,数学在社会学中不可能起到它在自然科学中那样的基础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威尔逊(T.P.Wilson)在《社会学和数学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能指望数学作为一种使基本概念和命题形式化的语言,能够帮助建立一门社会的自然科学。”^⑤首先,以为社会学理论应该完全使用数学的形式化语言的主张依赖于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一切的理性论述原则上可用标准的逻辑语言来表示。说到底,这个前提本身并不能用标准的逻辑语言来陈述,因为为了解标准逻辑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不能在标准逻辑范围内表达的有关真理的概念。^⑥其实,即便是形式化理论之极的公理系统也是有局限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

②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28页。

③ [法]保罗·利科尔:《理解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④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0页。

⑤ Thomas P. Wilson: "Sociology and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in 《Social Theory Today》, p.399.

⑥ 参见上书, p.392.

性的。早在1931年,奥地利年轻的数学家哥德尔(K.Gödel)便证明了在任何一个严格的数学系统中,都必定存在着该系统内的公理不能证明其成立或不成立的命题,即是说,任何系统都可能包含矛盾。就连数学这样严密精确的学科也失去了确定性和完全性,因而追求社会学理论的完全形式化或公理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科学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测量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要求观察者熟悉并能使用作为观察对象的人们用以描述他们自身行动和交互行动的方式。人们说些什么、想些什么、知道些什么,是我们从事任何课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时所绝对不能忽视的。既然社会现象涉及到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主观世界,社会科学便不可能坚持外部描述且不损失重要的有价值的内容,而主观世界是难以用形式化的数学语言来表示的。因此,威尔逊作出结论:虽然数学模式对我们化简复杂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但数学不可能将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形式化,就象它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作用一样。^①确实,在现实的社会学中,还找不到一个用数学语言表达的接近完全形式化的成功理论。

在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眼里,数学往往被当作一种中性的工具或方法,他们相信只要广泛地深入地运用这种工具或方法,便可使社会学的解释客观化、科学化。这种观点同样遭到了其他学派的驳斥。数学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它本身隐藏着某些不能证明的假设。数学在社会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理论上而不是方法上。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柯林斯(R. Collins)对统计学这一数学分支在社会学中的运用作了系统考察,他说:“最大的错误是将统计学简单地看作一种中性的方法。”^②并再三强调:“统计学是理论而不是方法。”^③统计学自身渗透着隐藏的理论假设,每一种统计方法都包含着特殊的理论偏见。正象概率论自己并不是建立在概率基础上一样,统计模型也不能用统计的方法加以检验。作为一种方法,统计在社会学中的运用是极其有限的,社会学中一些最杰出的成果都属定性研究而与定量分析和统计检验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微观领域里戈夫曼(E. Goffman)的拟剧论和宏观领域里华伦斯坦(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因此柯林斯认为:“数学,包括统计学,在社会学中的有效性主要是作为理论而不是方法。”^④作为理论,数学的主要用途体现在:一方面它可建立社会某些宏观过程的模型;另一方面数学的形式化语言有助于显示同一研究领域里各个理论原则之间的相关性。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数学在社会学中占据关键位置,按柯林斯的说法,“在社会学中,言语的、定性的理论较之数学总是更基本一些。”^⑤

四、结 语

以上从三个方面简略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的挑战。笔者认为,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观点中虽不乏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但也存在失之偏颇、武断之处,下面试述几点看法。

1. 从历史上看,尽管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主流,但它却有很大的局限性。科学方法(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只是针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而言,而不是所有的方面

^① Thomas.P.Wilson; "Sociology and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in 《Social Theory Today》, p.402.

^{②③} Randall Collins; "Statistics versus Word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1984》, p.331.

^④ Randall Collins; "Statistics versus Word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1984》, pp350-351.

^⑤ 同上书, p.353.

和层次。霍克海默曾经正确地指出：“与今天能够达到的知识水平相比，具体科学涵盖的那部分实在，不论就其范围来说还是就其深度来说，都是有限的。正如违反经过检验的科学结果是不能容许的一样，只用科学语言思考和表达是幼稚、偏执的行为。”^①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仅仅追求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探索其他研究途径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它将导致社会学研究的极端贫乏。早在150年前，孔德就认为建立科学的社会学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迄今为止社会学还没有出现自己的牛顿(I. Newton)、伽利略，如果按照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心目中理想标准去衡量，那么现有的全部社会学理论都不符合要求。结论很明显，将社会学完全自然科学化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

2. 一些极端的反实证主义者主张使用某种特殊的方法，比如“投入的理解”，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从根本上排斥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也是不正确的。虽然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它们同时又存在着无数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因而可采用相同的或相似的方法来研究它们。在社会学研究中，有可能并有必要创造性地引进自然科学中一些普遍适用的方法，这是使社会学走向精确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具有无限的方面和属性，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来把握这无限整体的所有方面和属性，任何理论和方法都具有不完全性。换言之，不存在一种万能的方法，通过使用它便可获得关于人类社会的完整知识，所以，自然科学方法和非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在本质上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在从事实际的研究活动中，研究主体应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或所需解决问题的性质，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他们必须清楚，任何一种单独的方法、单方面的角度都是有局限性的。

3. 社会和自然是否存在根本的差异，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对此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这种本体观上的对立导致了两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严重分歧，然而我们并不能找到一种经验的方法或纯逻辑的方法来证明对立双方孰是孰非，因而争论将会长期地继续下去。不过，如果我们对社会学史作一番考察，就会发现两派在一定范围内都能有效地指导社会研究，从而产生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只是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旨趣：一个旨在提出一种与人们的经验有清晰的、逻辑的关联并且能进行客观地检验（不依赖于特定的研究主体）的概念体系，并因而对社会现象的秩序性和规律性更感兴趣，推崇自然科学那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另一个旨在挖掘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意义并使思维变得愈发敏感的思想和观念，刺激人们不断地反思和探索，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生活并积极地参与其中，因而它非常关注某些特定事件或过程所拥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关注社会行动者的动机与意图，倾向于使用相对灵活的、主观色彩很浓的研究方法。概言之，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各执一端，在社会学中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范式，而一个时期内社会学家倾向于哪种范式，实际上受制于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由于两种范式都能产生富有价值的成果，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地否定任何一方。

4. 人类社会并不服从机械的决定论，作为主体的每个具体社会成员思考和选择都具有或大或小的能动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极端的实证主义者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现象便是杂乱无章的、毫无规律可寻。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任何现象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规律性，既然实证主义社会学意欲用科学方法来把握社会现象的

^① 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秩序和规律,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某种理论抽象,将社会看作不太严格的决定论系统也是容许的。科学哲学家本格(M. Bunge)曾经说过:“科学对于混乱或无规律性是无用的,因而它不能容忍极端的非决定论。”^①另外,虽然从本质上看社会是主体的人互动的产物,但作为人们持续互动的结果的社会结构,反过来会对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不管当事者意识得到还是意识不到),有时个人会觉得这种来自社会结构的压力是不可抗拒的,只能消极地适应。确实,单凭个人的力量难以触动和改变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所以,看不到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主体性固然是个悲剧,但无视社会结构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制约力也同样会落入误区。

5. 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力主排斥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一些反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信仰、旨趣等主观因素乃是知识的构成要素。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根据认识论原理,一切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主观因素或主体旨趣的影响,任何研究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不能证明的理论假设。不仅研究者个人不可能完全剔除个人的偏见或价值观,由研究同一学科的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持有共同的偏见,一句话,“科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做价值判断”。^②如果对这一点缺乏清醒的认识,不经常地反思科学自身的局限性,科学就有可能畸形地膨胀,导致有害的社会后果,近代科学发展史上便不乏其例。另一方面,无法消除所有偏见并不意味着必须保留所有的偏见,也不意味着研究者不应该、不可能清除那些不顾事实、无视逻辑的有害偏见和价值判断。而且,虽然研究者个人难以避免自己的偏见和价值观对研究过程的介入,但科学知识毕竟不是因人而异,以个人兴趣和意志为转移的东西,科学共同体可以通过公开的讨论、广泛的交流、批判的检验和重复的研究,将个人偏见和价值观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学不受纯粹个人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识地把客观性当作研究工作中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也未尝不可。

6. 有许多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争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共同误解基础之上的,比如他们都认为自然科学可给出物体运动的严格的因果说明,认为自然科学可建立完全形式化的概念系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可摆脱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无非是传统自然科学给人们造成的种种假象的产物,而本世纪诞生的量子力学、相对论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传统自然科学的形象,当代科学哲学对于以往关于自然科学的观念也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从认识论上看,自然科学的某些不可简约的预设并不具有经验的根据,它们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只有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③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可错的、可证伪的,任何事实或陈述都不是“中性”的,它们只有相对的意义。说明和理解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理解也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利,自然科学同样需要理解的方法。应该说,修正后的自然科学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科学更接近了。这反映了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融,各种理论和方法多元互补,而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之间的某些争论也会随着误解的消除而消逝。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分野由来已久,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社会学的基本格局。最近几十年来,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力量逐渐增强,新生的

① [加] 马里奥·本格:《科学的唯物主义》,张相轮、郑毓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② 参见[英]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③ 参见[美] 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汪天骢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1页。

理论流派大多持反实证主义的观点。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严峻挑战这一事实，昭示了实证主义社会学再也不可能在社会学中占据统治地位，但绝不意味着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被完全抛弃。实证主义社会学作为人们探索人类社会奥秘的一种理论取向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它所倡导的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主张也会有人继续奉行，批判地借鉴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始终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各种反实证主义社会学观点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揭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谬误、缺失和局限，一方面促使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身进行不断地调整、修改以日臻精确和完善；另一方面可激发各种有价值有创造性的新理论的产生，以从根本上弥补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不足，丰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化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责任编辑：唐 军

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新成果

——《社会学概论》（西安本）读后

由西安地区高校社会学教师集体撰写的《社会学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问世了。综观全书，感到它有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鲜明而科学地坚持了唯物史观。社会学是一门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社会科学，马克思是国际公认的社会学理论创始人之一，他的唯物史观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学众多理论流派的发展。该书在全面介绍西方社会学中不同理论、流派、观点的同时，坚持以唯物史观统揽全书，批判地综合各种有益成份，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中国当今的社会发展服务。该书设专章全面概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说，并把理论焦点集中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形态”问题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等问题，作了明确、科学的揭示。

其二，具体而深刻地结合了中国现实。社会学又是一门以研究现实社会为主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只有密切联系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造力，从而担负起自己的理论使命和学科责任。该书各章除阐明有关的一般理论外，都把主要篇幅放在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现状和阐明今后发展方向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书突出改革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改革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均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社会改革的教科书。

其三，及时而丰富地反映了最新成果。该书中凡涉及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部分，都引用了大量近年来社会学工作者们的最新调查、研究成果等资料，并与国外资料相对照，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凡涉及目前学界存在歧见的问题，都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种主要观点，尤其突出地反映了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在研究、探索中获得的一系列最新成果，使人感到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一扫不少同类书籍中的沉闷、陈旧之气。

（晚雨）